

## 走过青春



● “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能回来来看我们”



● 再回延安看乡亲



● 北京知青袁克定看望曾经担任郭家塬大队队长的聂江东老人



● 过去的小媳妇，现在都成了老太婆了。这次见面说的全是当年一起干农活时的糗事

# 我认识的延安北京知青

闫百成

1969年，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这将永远载入史册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、进步、变化，北京知青相继被招工，进入了机关、厂矿和企事业单位，从此，生活开始了转变。

李增春，曾在下坪插队两年多，于1971年底被招到延安地区水利施工队，安排的工作是收发员。1973年以后，从事了电影放映工作。

两年的农村生活使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对组织分配安排的各项任务都爽快接受。工作中，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。正因如此，他也得到了领导、同事和单位周边居民的认可。在单位及周边一带，只要提起李增春的名字，真是老少皆知。

单位有一个多功能大礼堂，平常是饭堂、会议室，白天也可以在这里放映电影。一台放映机，伴随了他近二十个春秋。直到电视机普及后，这台放映机就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那个年代，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。由于当时的影剧院只有一部片子，几家单位都要上映，这就免不了等片、跑片、倒片、搬运，相比之下，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个人增加了劳动强度。可这一切，都是他一个人完成，并且无怨无悔。

伴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已经到了古稀之年，可那颗不老的心依旧奋发向上。只要是有益社会的活动，他都积极参与，不计报酬。在筹建延安北京知青

博物馆时，他跑前跑后，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，得到了相关单位的表扬认可。

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如今的他，虽然双鬓染白，但从未停止过前行的脚步，把自己的才华尽量展示出来。他先后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作品，在延安各类杂志、报刊刊登，用手中的笔描绘着美好的未来。

无独有偶，很多知青的故事同样让人回味。

当年的施工队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王学晏的腿，李望伦的嘴！”从表面理解，一个是腿脚利索，行步如飞；一个是口若悬河，能言善辩。

王学晏，北京知青，个子矮小，其貌不扬，走起路来一阵风。他在中队担任材料员，每次领料时，仅凭两条腿往返。中队在延安南二十里铺沟门，距队部库房十多公里，有时领到几十公斤的机械配件，他都手提肩扛步行往返，令人生敬。

最使我敬佩与难忘的是北京知青张小弟，他曾在南泥湾插队，1971年被招工到施工队。在王窑水库大会战中，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。

工作中，小弟积极肯干，认真负责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困难面前从不低头。他对同事仗义大方，谦虚温和，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。回京后，由于劳累成疾，患了绝症。去世之后，家属根据他的遗言，将遗体无偿捐献北京协和医院。他的一

生是奋斗的一生、坎坷的一生，他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最需要的人。真可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1971年3月，延安大地依旧天寒地冻，冰雪尚未消融，杏子河上发生了冰河救美的故事。

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北京知青刘铁良和谢春萍。

王窑水库前期工程基本完成，计划3月9日大坝合龙。合龙之前，所有停在河对岸的机械设备全部都要转移过来。否则大坝合龙后，河水上升，再过河就困难了。

当时停在河对岸的有三台拖拉机，北京知青李万春、李望伦等人开着两台拖拉机在冰河上顺利通过。开第三台拖拉机的是刘铁良，陪同的是谢春萍。当拖拉机走到河道中间，突然一声巨响，人机瞬间沉入河底。河水不是太深，但足以没过整台拖拉机。看到这一幕，岸边的人顿时惊恐万分。突然，刘铁良的头露出水面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钻入刺骨的水中，把谢春萍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。在岸上人员的接应下，两人都脱离了险境。人无大碍，只是虚惊一场。

刘铁良身高一米八几，落水的那一刻，他临危不乱，急中生智，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祸。从此，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，最终结为夫妻，成就了一段姻缘。

北京知青为延安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，他们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。

## 去延安卖西瓜

王淑琴

陕西洛川曾是我下乡插队的地方，现在成了享誉世界的苹果种植基地。由于洛川地处渭北黄土高原，气候、土壤和地理位置成就了苹果的美味。除了苹果之外，这里的西瓜也长得又大又甜。

说到西瓜，那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经济农田。在那个缺少少穿的年代，全村人都盼望着风调雨顺，西瓜丰收，能卖个好价钱，给队上增加点收入。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知青，自从知道队上要种西瓜，更是朝思暮想，盼着能早日吃上西瓜。

到了8月，眼看着西瓜长大了，我们几个知青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专门休工一天，跑到瓜地去买西瓜。种瓜老汉一看见我们就笑了，因为在西瓜刚长到碗口大时，我们就偷偷地摘了一个，心里有数的种瓜老汉把丢瓜的事告诉了队长。队长很委婉地告诉我们，瓜没有长成吃不得，也是一种浪费。

这次，当种瓜老汉看到我们后，就赶忙招呼我们：“几个女子是来买瓜的吧！老汉我去给你们挑一个最甜的。”我们抱着买来的大西瓜回到窑里，几个人围在案板边，非常有仪式感地擦干净瓜皮上的尘土，一刀下去，西瓜皮炸裂，露出红瓜瓤。我们急不可待地捧起西瓜，一口咬下去，又酥、又沙、又甜，真是太好吃了。

到了中旬，西瓜开始大面积成熟，队长派会计俊峰、发贵和俊清三位村民，外加知青王敏和我一起去延安卖西瓜。能有这美差真是太高兴了！一来，可以游览革命圣地延安；二来，守着西瓜可以天天吃啦！当天下午，我和王敏就开始忙着跟老乡们一起摘西瓜。挑成熟的西瓜摘取，对于我们俩来说可是个技术活，种瓜老汉凭着他的种瓜经验，示范着挑选瓜的动作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“一看、二拍、三听”。只见他蹲在地上，用那饱经风霜的大手拍拍这个，打打那个，然后果断地摘下。由于生熟西瓜的水分含量不同，所以响声也不一样。熟了西瓜拍打出来的声音有些闷，生西瓜敲击声则比较清脆。我俩重复着老汉的动作，仔细辨别西瓜的生熟。生怕摘了生瓜卖不出去而给队上造成损失。几个摘瓜的老乡发现我们拿捏不定的时候也会及时出手，帮助我们确认。最后，我们把精挑细选的一个个大西瓜抱到田头，装在架子上，装了满满的三轮车。几个人回家吃了点东西，踏着夕阳的余晖就出发了。

从洛川到延安大约要走上三天。三个年轻小伙驾着车，三头牲口在前面拉着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车队。我俩大步流星地跟在后面，心想马上就可以看到宝塔山了，不由激动万分。

一路行走在通往延安的公路上，石渣铺成的路面坑坑洼洼，汽车一过，除了“嘎巴嘎巴”的响动，就是黄尘飞扬。

走着走着，我和王敏远远地落在了乡亲们后边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路上连一辆过往的汽车也没有，四周静悄悄的。路过村子时，偶尔可以看到窑洞里传出的亮光，听到几声狗叫。我是个特别胆小的

人，就害怕天黑，何况在这偏远之地。一路上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我就异常紧张。

我和王敏走在石渣路上，脚下发出的“嚓嚓”声都那么瘆人，总感觉后面跟着人……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只是紧紧拽着王敏的手臂，心里默默地念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；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！”来给自己加油。

前面的乡亲们大概也走累了，停下来休息时，才发现我俩没有跟上。乡亲们用当地呼喊人的声调叫我俩：“哦——王敏，哦——淑琴……”这一声声呼喊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被黑夜吓得不知所措的我听到喊声后，立马有了胆量。“我们在这儿呢！”我随即回应。当走到乡亲们跟前，我俩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心里直后悔不该接受这趟“美差”。

乡亲们看到我俩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心疼地说：“不行你俩就上车吧！”村民发贵还开玩笑逗我们说：“到时把你俩和西瓜一块卖了。”当时累得那还顾得上逗笑，我俩不管不顾地爬上了车，躺在西瓜堆上。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，伴随着车子的晃悠悠，我俩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车队走了一个晚上才走出洛川界，来到富县。车子停在一块玉米地旁，老乡把我俩叫醒。一睁眼，看到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，还能听到河水流淌的“哗哗”声，我感到新奇。因为洛川在塬上，不仅没有河，就连吃的水都很困难。穿过玉米地顺着水声走了过去，看到一片不宽的水面。水流湍急，银白色的浪花互相追赶着，声音很大。久违的河水直抵心底，我心里突然酸酸的。“此时咱们的家人都还在睡梦中呢，如果父母知道咱们走了一晚上的山路，现在还在这荒野之地，得多操心呀！”我对王敏说。说完，我把身子转了过去，王敏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几个老乡掰了些玉米棒子，就地挖了一个小土沟，把玉米带皮整齐地码在上面，找些干树枝和干草放入土沟点燃，烧烤起了玉米。火苗吐着小红舌头，我们的身上暖和多了。老乡不停地用手翻滚着玉米，不一会儿，玉米的香气就被烤了出来，散发着诱人的味道。老乡让我们先吃。那一刻，我们的肚子真的饿了。虽然玉米的外衣被烤得黑黢黢的，可剥开之后，黄色玉米粒整齐地排列着，咬一口，别提多香了。我们边吃边说笑着，一身的疲倦和那忍不住的伤感被这一顿晚餐吃进了记忆里。

此时我们已经走了近八十里山路，真是人困马乏了。我们来到了车马店，就是人和牲口歇脚的地方。院子很大，到处都拴着牲口，还有装货的架子车。赶早的人忙着收拾准备出发。老乡把我们的西瓜车停好，把牲口拴到水槽前吃草，三位男性老乡被安排在大通铺的房子里。我俩住哪儿呢？用心的小老板把我俩领到了一间装满草料的房间，在土炕上扒出一小块地方，弄了一卷子铺盖放在炕上，就选了我俩下榻的地方。入乡随俗，没有挑选的余地，铺上被子，和衣而睡，伴着草料特

有的甘味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已经到了晌午。我们在车马店吃了碗面条，三头牲口连吃带歇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继续北上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第三天中午到达了延安。

延安是革命圣地，是毛主席居住过的地方。虽然我们特别想四处逛逛，但我俩非常明白，我们的任务是来卖西瓜的，等卖完西瓜再说吧！车队直奔市场，开始卖西瓜。西瓜每斤售价0.12元，现在看起来不贵。可上世纪60年代末居住在延安的人，花几块钱买个西瓜吃，也算是件奢侈的事。老乡为了招揽生意，使出了杀手锏——让我们两个知青卖西瓜。对于我们俩来说，卖东西还真不是第一次。在学校做“学工”时，曾到国营菜站和售货员一起蹬着三轮车到农村卖过菜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来看北京知青卖西瓜的人还不少。人们围拢在我们周围问这问那，问我们是北京哪个学校的？在哪儿插队？来这里生活习惯吗？话语中透露出延安人对知青的关爱。我们也是有问必答，不忘推销我们的西瓜。当他们知道我们从洛川来，走了三天才来到延安，感到真不容易，不忘买个西瓜表示对我们的支持。老乡们把切好的西瓜让大家尝一下，主动帮顾客挑选，并承诺生瓜包换，秤给得足足的，顾客非常满意。诚信让我们赢得了市场，一下午就卖出去了一车多的西瓜。

时值盛夏，正午的太阳烤得我们汗流浹背。由于体会到这一路上的艰辛，我们再也舍不得吃一口西瓜，就想多给队上卖点儿钱回去。为了尽快把西瓜卖完，我俩建议走街串巷地叫卖。老乡一听有道理，按照我们的建议把西瓜拉到了家属区。这里的人们听说北京知青从洛川前来卖西瓜，出于好奇，少不了顺便买一个。

我们的西瓜在延安卖了不到两天，还剩下少半车。负责人俊峰决定把剩余的西瓜拉到甘泉去卖，还决定让我俩在延安多待一天，帮助我们实现登宝塔山、参观革命纪念馆的心愿，然后坐汽车回洛川。我俩看到卖西瓜的任务还没完成呢，怎能半途开小差？于是决定放弃参观，跟着老乡一起去甘泉。

延安到甘泉三十多里路，我们走了三个小时就到了。甘泉县的大街上、电影院旁边都留下过我们卖西瓜的身影。和老乡预料的一样，我们在甘泉卖掉了剩余的西瓜。

西瓜卖完了，我们坐在架子上。小毛驴似乎也为我们能够出色完成任务而高兴，一路小跑着前行。中途到了一个叫茶坊的地方，我们仍然住在车马店。这店不大，没有多余的房间，我们五个人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内。房间内有一个大通铺，倒是很干净，我俩睡一头，那三个老乡睡另一头，就这样过了一夜。会计俊峰还在这里买了点菜，利用店里的厨房亲自给我们做了一顿臊子面，算是犒劳大家。

回到村里，一同去的几个老乡直夸我俩能干，我们也开了女知青出去卖西瓜的先河。

“我的第二故乡”——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